

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叙录(二)

李致忠

《集韵》十卷 宋丁度等撰 宋刻本。

我国古代的韵书，实际是按声韵编排的字书。其功用类乎现在的字典，是专备古人写作诗词歌赋时查检协韵之用的。我国韵书的产生和发展，缘于文字的不断增加、声韵的日益变化，以及歌诗词赋的逐渐发展。故自魏李登的《声类》以降，便有吕静、沈约、夏侯咏、阳休之、颜之推、陆法言等数十家相继哀集。入唐以后，诗歌灿烂，光耀文坛，对韵书的要求更加迫切，又有王仁昫、李舟、颜真卿、孙愐等，或起而增损旧韵，或筭路蓝缕，另集新书。如王仁昫的《刊谬补缺切韵》，颜真卿的《韵海》，孙愐的《唐韵》等。宋初，国势初定，无暇重辑新的韵书，便由陈彭年、丘雍等刊益《切韵》，而成《广韵》，以敷时用。到了仁宗朝，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、太常丞直史馆郑戩等建言：陈彭年、丘雍所定之《广韵》，多用旧文，繁略失当，宜辑新书。宋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于景祐元年（1034）命宋祁、郑戩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、王洙等同加修定，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、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。至宝元二年（1039）书成上之，凡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，较《广韵》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。平声四卷，上、去、入各二卷，凡十卷，诏名曰《集韵》。

《集韵》于故书雅记所载之奇字异音甄采致备，其赅博超越前修，不失为韵书之总汇。故被誉为“自许叔重而降，凡数十家，摠为《集韵》”。南宋田世卿称“旧闻《集韵》收字最为该

博，搜访积年，竟未能得。”足见《集韵》在宋代的影响是颇为深广的。然此书于元明两代并不显用，盖自金人改并成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以后，政府考试诗赋，文人作近体诗歌，都以平水韵为标准。直到清初，朱彝尊得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《集韵》，并委托曹棟亭刊于扬州使院，此后才有段玉裁、戴震、姚覲元等人相继研究《集韵》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姚覲元《集韵校正会编》稿本四卷，于宋本、影宋抄本之校勘，及段氏、韩氏等的研究成果熔为一炉，是研究《集韵》的重要文献。

传世的宋本《集韵》，通常说法有两种版本：一为北宋庆历原刊本；一为南宋淳熙重刻本。庆历原刊早绝于人世，今仍可窥其面貌者，赖毛氏汲古阁和钱氏述古堂两部影宋抄本。这两种抄本均为每半页十一行，行大小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据说它们同祖于庆历原本。毛氏汲古阁抄本后归宁波天一阁，钱氏述古堂抄本后归上海图书馆。一九八三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馆藏本，将此书依原样影印行世。其所祖虽非庆历原本，但述古堂所影抄者，其版式行款、字体刀锋，一如宋版，故庆历原刊之旧观亦借此宛然可见。

此书另一宋版，便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田世卿安康金州军刻本。该本传世者通常说法亦有两部：一部藏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，即现在的书陵部；一部则藏于北京图书馆。过去对这两部藏书同为一版的说法未经严格考证，故未免人云亦云，难置可否。现在看来，两书未必是相同版本。

日本图书寮所藏此书，当年傅增湘先生观光日本时尝亲眼见过，并作了详细的描绘和记录。这个记录后来收入了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。现据藏园所记，将有关部分内容摘录如次。

日本图书寮所藏宋版《集韵》为“每半叶十行，大字三当小字四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版匡高广异常，纵九寸四分，广六寸六分。卷十后有宝元二年九月十一

日延和殿奉旨镂版施行牒文，下列赵师民等衔名十八行。又庆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送国子监施行，下列贾昌朝等衔名八行。后有田世卿跋。”傅先生将此书自然状况描述介绍之后，紧接着就照录牒文、衔名和田世卿跋文。

牒文称：“景祐元年三月，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、三司户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馆郑戩等奏：‘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，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，如叙序、坐座、底氏之字，或借文用意，或因释转音，重叠不分，去留难定，有司论难，互执异同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。盖见行《广韵》、《韵略》所载疏漏，子注乖殊，宜弃乃留，当收复缺，一字两出，数文同见，不详本意，迷惑后生，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《广韵》，使知适从。’诏祁、戩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，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、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详定。又以都官员外郎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尝纂《群经音辨》，奏同刊修。至宝元二年九月书成上之。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进呈，奉圣旨镂版施行。”

牒文后，傅先生详录赵师民等衔名，且于丁度名后再录“庆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，延和殿进呈，奉圣旨送国子监施行”牒文。牒文后又详录贾昌朝等衔名，最后详录田世卿跋文。

跋文称：“卿旧闻《集韵》收字最为赅博，搜访积年，竟未能得，皆云此版久已磨灭，不复有也。世卿前年蒙恩将屯安康，偶得蜀本，字多舛误，间亦脱漏。尝从暇日委官校正，凡点画错谬者五百三十一字，其间湮晦漫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，正文注解脱漏者三十三字。继得中原平时旧本重校，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。旧本虽善，而书字点画亦有谬误。复以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等书是正，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。因令钹板，以广其传。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，仅能毕工，亦庶几不作无益害有益之义也。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田世卿谨跋。”

傅先生对日本图书寮所藏宋本《集韵》所做的这些记录，可

以使我们从中明确如下几个问题。

一、北宋仁宗时撰辑《集韵》的缘起，是由于举子们诗赋常误使音韵，或借文用意，或因释转音，重叠不分，造成混乱。其致误的原因，与《广韵》、《韵略》的疏漏有很紧密的关系。故由皇帝诏命儒臣赵师民、孙锡、王洙、宋祁、贾昌朝、郑戩、李淑、丁度、晏殊、章得象等同加修定。

二、《集韵》成书于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，当时由延和殿进呈，且奉圣旨镂版施行。至庆历三年八月十七日，全书镂版工竣，仍由延和殿进呈，亦奉圣旨送国子监施行。这就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《集韵》的提要产生了齟齬。《总目·集韵》提要称：“考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序，称‘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、李公淑增崇韵学，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，摠为《集韵》。而以贾公昌朝、王公洙为之属。治平四年，余得旨继纂其职，书成上之，有诏颁焉’……则此书奏于英宗时，非仁宗时，成于司马光之手，非尽出于丁度等也。”宋版《集韵》牒文说书成于宝元二年（1039）刻成于庆历三年（1043）；《总目·集韵》提要却说书成于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前后相差二十八年。岂有宝元二年成书，庆历三年即已雕版印行了的《集韵》，反倒于二十八年之后成于司马光之手了呢？实难费解。盖四库馆臣未睹宋版《集韵》牒文，而误信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所致。窃意宋版《集韵》牒文无庸置疑，而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及其自序，则大可研究。《切韵指掌图》本身就不是司马光的作品，这一点早有人提出过怀疑和论证。有人说《切韵指掌图》是杨仲修的伪託之作，也未必靠得住。此书虽见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但不见于《郡斋读书志》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并不是不可参考的，但于此书大概是著录错了。综合各种材料，此书盖完成于南宋宁宗或理宗朝，而伪託司马光之名。四库馆硬是据此书自序给《集韵》的成书年代下结论，是不可置信的。

三、前边说过了，古代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，是供诗人词客，特别是士子们经常检用的工具书，故一经政府颁行，翻刻重雕者颇多。以《集韵》而论，现在所知者，光宋代就有庆历原刊本、蜀刻本、中原本等，到淳熙十四年又有田世卿金州军重刊本。而田氏刻本，所据为蜀刻本，校以中原平时旧本，正以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等书。

四、田刻本《集韵》为每半叶十行，大字三当小字四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匡高为九寸四分，宽六寸六分。

明确了上述这些，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《集韵》就可以得到比较和考定。归纳起来，北京图书馆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有如下几点不同。

一、北图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行款虽然相同，但版匡大小却不同。日本藏本高九寸四分，宽六寸六分；北图藏本高八寸六分，宽六寸〇分。此为两本不同之一证也。

二、日本藏本牒文、衔名、识语俱全，而其重刻时所据祖本是蜀刻本，表明蜀本还保留着庆历三年雕印成书，奉旨由国子监施行时的牒文和衔名。而北图藏本牒文只存“景祐元年三月”至“上烦”一段，“上烦”以下的编撰人衔名及田氏跋语均付缺如。当然，仅就牒文残全并不能推断出两本就一定不同。但北图藏本的牒文残存，恰与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所存牒文完全一致，说明北图藏本重刻时的祖本，可能就是残缺了牒文的北宋庆历原刊本。因为钱氏述古堂所影抄者就是庆历原本。所不同者，庆历原刊为每半叶十一行，北图藏本为半叶十行，说明重刊时行格变得更疏朗了。此为两本不同之二证也。

三、日本图书寮藏本牒文中之“叙序、坐坐、氏氏”等字，北图藏本则作“叙序、座坐、氏底”。傅先生的记录假若没有疏漏和纰谬，则此处之不同，是两部绝非同版的最有力证据。

四、日本图书寮藏本可能没有刻工。根据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的体例，凡遇宋本有刻工者，傅先生多数都注明“版心下记刊工姓名”，甚至成批逐录刻工名氏。然于日本图书寮所藏宋本《集韵》，傅先生著录十分翔实，独于刻工有无，傅先生却只字未提。这是否为傅先生的疏忽，笔者不敢得出这样的结论。所能据以推断者，当是日本藏本没记刻工名氏。但北图藏本刻工颇多，主要是长沙的一批刻字工人。如：正其、世安、黎美、佺、信、世明、邦信、廷、世门、长沙李春、王和、吴良、朱春宽、见、昌、文珍、世荣、侯珠、卖院、张交、张六、汤二日、何秀、刘忠、长沙陈禾、长沙李椿、长沙张来、长沙王和、长沙李粉、星城陈广、长沙陈庚、长沙叶林、长沙吴良、长沙升、邵康、陈正、长沙吴正、其良、长沙钊正、长沙陈升、长沙叶春、长沙王禾、长沙何万、长沙陈子秀等，刻工良多。设使日本藏本也有如此众多的刻工，傅先生怎么可能一字不提，一名不录呢？适见日本藏本本身就未记刻工。此为两本不同之四证也。

当然，上述四点之不同，系就傅先生当年日本观书记录勘比出来的。因此，这里似可大体做出结论，即日本图书寮所藏《集韵》，为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田世卿陕西安康金州军刻本；而北图藏本《集韵》则是另一宋刻本。那么北图藏本究竟又是何时何地刻本呢？

第一北图藏本盖亦刻于南宋孝宗朝，此由本书的讳字大体可以得到证明。北图藏本于宐、宐、蕝、澈、澈、愨；匡、诤等字，皆缺末笔，表明其于宋宣祖、太祖讳皆避，这当是庆历原刊之旧观。而于亘、峒、垣、椐、莞、完、丸、纒、纨、皖等字不避；于構、媾、購、搆、購等字亦不避，表明其于钦宗、高宗嫌名则不讳。而于敦、惇、豎、墩、墩、鞞、鞞、螽；扩、郛、榔、滂等字亦不讳，表明其于光宗、宁宗嫌名所涉之字亦不避。然于“慎”字则基本都避，如韵例中“凡字训，悉本许慎《说

文》”，“慎”字则缺末笔。但下一句“慎所不载，则引它书为解”的“慎”字，又不缺末笔。卷二·十七真当中的“慎”字又缺末笔。其注文“慎慎”之“慎”字亦缺末笔。同卷“慎”字注文曰“兽五岁为慎，郑众说”。其中的“慎”字亦缺末笔。表明其于孝宗名讳基本均避。这种前不避高宗，后不避光宗，只避孝宗和远祖、太祖的现象，当是此书重刻时的特有现象，表明它是南宋孝宗朝的重刻本。

第二、北图藏本刻工颇多，且多数标明为长沙人。长沙即宋代荆湖南路的潭州，即今湖南长沙。早在北宋时期，湖南就同京城开封及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山西、广东等地一样，是全国有名的刻书地区之一。南渡以后，黄河流域全部丧失，南宋所有的地域，仅限于长江、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。孝宗以后，时局渐趋稳定，经济逐渐繁荣。特别是长沙，在南宋初年连续丰稔三十八年，出现了“斗米二三钱，县县人烟密，村村景物妍”的繁荣景象。本来就喜刻书的湖南，此时更加盛行。南宋的刻书地点，可考者盖有一百七十三处，其中荆湖南路的潭州（长沙）、湘阴、衡州、道州、永州、零陵、郴州、桂阳军、邵阳，全州、武岗军、茶陵军等，就都是可考的刻书地区。而北图藏本《集韵》刻工又多系长沙人，因疑此书即是湖南刻本。当然，长沙的刻工也许会跑到别的省分从事刻书事业，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刻工，常可借水路之便傭工他省。但不管怎么流动，大概也不大容易越过湘北，穿过湖北，而跑到陕西安康去为田世卿刊刻《集韵》。且北图藏本《集韵》，纸面似有一层白色粉末，与元大德间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刻本《梦溪笔谈》的纸色相近。盖湖南潮湿，纸面敷有灰粉，可能于防潮有益。两书刊刻相隔时间虽远，然于造纸的传统和技法上很可能一脉相承，形成独有的特点。综合刊工里籍、纸质特点及湖南刻书的历史状况，推断北图所藏《集韵》为南宋孝宗时湖南地区刻本，大体上应当是可信的。

北图藏本《集韵》，明清两代均系官书，一直为中秘珍品。今各卷卷端骑栏仍钤有“文渊阁印”关防，表明此书在明代就是内府官书。明初曾都南京，随着永乐迁都北京，原南京内府的一些重要藏书也随之北移新都，存贮于左顺门两廊。直到正统六年（1441）才移贮文渊阁。在移藏过程中，由杨士奇领衔，对所有旧藏进行清理，并点造清册，成《文渊阁书目》。今检此目，的确著录有“丁度《集韵》五册，宙三百八”。这表明此书早在正统六年以前就已收归内府，甚至干脆就是从南京运来的。

清朝定鼎以后，全盘继承了明文渊阁的藏书，此书盖于乾隆时移入天禄琳琅。今仍钤有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、“五福五代堂”、“古稀天子宝”、“八徵耄念之宝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太上皇帝之宝”，表明其确系天禄旧物。查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续编，此书确见著录。且称：“《集韵》二函十册，宋丁度等修……书十卷，前韵例，载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，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，诏名曰《集韵》……未有宋祁等奏举子失韵事。”今检此书，与天禄所记一一相合。且扉页为清初大罗纹纸，钤盖五玺印。封面为磁青绢面，黄绫书签。表明此仍是天禄旧装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续编还说：“是书槧法字体，的是宋本。”今观此书，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钱，墨似点漆；白口，双鱼尾，左右双边；上鱼尾上方镌大小字数，上下鱼尾之间镌声韵次第，即卷次，下鱼尾下方镌刊工姓名。所有这些特点，俱是宋版风貌，足见天禄所定不失章法。

综上所述，北图藏本《集韵》，盖与日本图书寮藏本不同。如果此说能够成立，则两本均系举世孤本。设使两本均能影印行世，其于传播孤本、校定异同以及韵学研究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
《切韵指掌图》一卷 题宋司马光撰 宋绍定三年(1231)越之读书堂刻本。

《切韵指掌图》，自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以降，一直到清乾隆

时期编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几乎所有的公私目录，都将此书的作者著录为司马光。其实始作俑者远不是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而是南宋嘉泰三年（1203）董南一始刻《切韵指掌图》时的一篇后序。序称：“……《图》盖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所述也。”当然，董序亦不无根据，其根据便是此书卷首司马光的自序。现将司马光自序其文移录于次：

“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、李公淑增崇韵学，自许叔重而降，凡数十家，总为《集韵》。而以贾公昌朝、王公洙为之属。治平四年，予得旨续纂其职，书成上之，有诏颁焉。尝因讨究之暇，科别清浊，为二十图，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。推四声相生之法，纵横上下，旁通曲畅，律度精密，最为捷径，名之曰《切韵指掌图》。呜呼？韵学之废久矣，士溺于所习，读书缀文，趣了目前，以至览古篇奇字，往往有含糊嚅嚅之状。是殆天造神授，以便学者，予不敢秘也。涑水司马光书。”

这篇所谓司马光的自序，影响极深，假若把董南一姑也算做受骗之列，那么便一直骗到饱学之士的四库馆臣。下面再移录一段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关于《集韵》的提要，便足见其影响之深了。提要称：“……然考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序，称‘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、李公淑增崇韵学，自许叔重而降，凡数十家，总为《集韵》。而以贾公昌朝、王公洙为之属，治平四年，余得旨继纂其职，书成上之，有诏颁焉。尝因讨究之暇，科别清浊，为二十图’云云。则此书奏于英宗时，非仁宗时；成于司马光之手，非尽出丁度等也。”

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关于《切韵指掌图》的提要亦称“且以见立法之初，实因《集韵》而有是书（指《切韵指掌图》）；非因是书而有《集韵》。凡后来纷纭轆轳，均好异者之所为焉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这两段提要意思很清楚，即是说北宋仁宗时始纂的《集韵》，到英宗治平四年才由司马光最后完成，非成于仁

宗时，更非尽出丁度等人之手。且明确说司马光实因《集韵》而成《切韵指掌图》，而非因《切韵指掌图》而成《集韵》，这就完全蹈袭了《切韵指掌图》所谓司马光自序的说法，而一致两误。

首先是对《集韵》成书的论列错误。日本图书寮（现称书陵部）所藏南宋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田世卿陕西安康金州军刻本《集韵》卷末的两道牒文是资佐证。（见上文所引）。

这无可辩驳地表明，《切韵指掌图》所谓司马光自序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，是靠不住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《类篇》的提要中已提出怀疑，择录一段如下：

旧本题司马光撰。景定（应是嘉泰）癸亥董南一作光《切韵指掌图》序，亦称光尝被命修纂《类篇》，古文奇字搜猎殆尽。然书后有附记曰：‘宝元二年十一月，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，今修《集韵》添字既多，与顾野王《玉篇》不相参协，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，别为《类篇》，与《集韵》相副施行。’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，诏洙修纂。久之，洙卒。嘉祐二年九月，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。三年四月，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、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。六年九月，宿迁枢密副使，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。治平三年二月，范镇出镇陈州，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。时已成书，缮写未毕，至四年十二月上之。然则光于是书，特缮写奏进而已，传为光修，非其实也。”

这段提要讲得很清楚，表明司马光于治平三、四年继纂过《类篇》，而非继纂《集韵》。且就是《类篇》，也只不过是组织续缮写奏进而已，实际的修纂工作也并未参加。可见《切韵指掌图》所谓司马光的自序，绝非司马光的手笔，他人伪託，无庸置疑。自序既伪，其书当然亦伪。

且查昭德先生《郡斋读书志》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亦均不见有关《切韵指掌图》的著录。这两部书是南宋有名的两

部目录专著，设使《切韵指掌图》真是司马光的著作，以其德行文章满天下的声誉，谅这两部目录专著是不会不著录的。这就是说，当这两部目录专著先后问世的时候，《切韵指掌图》可能还没有产生。如果当真是这样，那么还从何谈论《切韵指掌图》是司马光的作品呢？因为司马光早在北宋元祐元年（1086）就已辞世了。这么早就已作古的人，难道会在南宋中期又产生作品吗？这岂非咄咄怪事！

再查《司马光传家集》，关于司马光的著作，上至长篇巨著，下至投壶、新格之类，无不具载。惟于《切韵指掌图》，则只字未题。此亦进一步说明，《切韵指掌图》根本就不是司马光的作品。

当然，说《切韵指掌图》并非出自司马光之手，绝不是始自今日，清朝同治时的邹伯奇，尝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为《切韵指掌图》作跋（详见《邹徵君存稿》），首先对此书作者提出了怀疑。其怀疑的主要根据，是他见到了宋孙觌为杨仲修《切韵类例》写的一篇序文。他认为孙氏《切韵类例》序，与所谓司马氏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内容雷同，文字酷似。而《切韵指掌图》版行于世又晚于孙氏之序，故认定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是对孙氏《切韵类例》序的抄袭。这样就从根本上揭露了司马光作《切韵指掌图》的虚伪性。为了便于勘核，现将孙氏《切韵类例》序择录于次：

“……弘农杨公（指杨仲修），博极群书，尤精韵学。古篇奇字，一览如素习……。昔仁宗朝，诏翰林学士丁公度、李公淑增崇韵学，自许叔重而降，凡数十家，总为《类篇》、《集韵》，而以贾魏公、王公洙为之属。治平四年，司马温公继纂其职，书成上之，有诏颁焉。今杨公又继其书科别户分，著为十条，为图四十四。”他这段话说得比较笼统，但就内容文字看，的确与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极其相类。邹伯奇据此断为《切韵指掌图》

自序是抄袭了孙覿《切韵类例》序。孙氏《切韵类例》序已在司马光之后了，那么抄袭者自然更在其后了。因此结论《切韵指掌图》定是伪託之作。

本来邹伯奇这个推论无可非议，但一九六二年影印严式海《音韵学丛书》本《切韵指掌图》时，陈操先生写《重印后记》又提出了异议。他说：“《切韵指掌图》的刻板虽然在孙覿之后，而司马光的年辈却在孙覿之前。假定真是司马光的手笔，则未刻以前也许会有抄本流传，单从刻版年月在孙覿之后来肯定这篇序是谁抄袭了谁，理由还不够充分。”陈操先生这段话原则上没有错误，但他忽略了一个前题，即如果真是孙氏抄袭司马氏，那么司马氏自序就是靠得住的了。问题是司马氏自序本身就是虚伪的，因此就不存在孙氏抄袭司马氏，而只能是别人伪託司马氏之名抄袭孙氏。邹伯奇的结论没有错，只是论列征引不足而已。但他第一个指出《切韵指掌图》的作者伪託问题，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至于陈澧就邹氏之说顺水推舟，干脆把《切韵指掌图》的作者索性归于杨仲修，那就更是根据不足了。

三十年代，还有赵阴棠君祖述邹伯奇之说，推论《切韵指掌图》嘉泰三年版刻之年代，就是其成书年代。可见，指斥《切韵指掌图》为伪託之作，早在清朝就开始了。我这里重谈这个问题，无非是引证了一些前人能未见到的资料，进一步证实《切韵指掌图》绝非司马光作品，而是南宋人的伪託之作。至于有人把《切韵指掌图》怀疑为元朝人的删并改拼之物，那是毫无根据的。只以现今仍有宋刻本《切韵指掌图》存留于世这一点而言，元人删并改拼之说就不攻自破了。

否定《切韵指掌图》是司马光的作品，看来已经是比较容易地做到了，但要肯定究竟是什么人伪託的，那就要困难得多了。清人陈澧就邹伯奇之说，推断是杨仲修的伪託之作，表面看来也不无道理。因为杨仲修的确精于韵学，且于《集韵》之后，又

“即其书科别户分，著为十条，为图四十四。推四声字母相生之法，正五方言语不合之讹，清浊重轻，形声开合……。”（见《鸿庆居士集》卷三十）以成《切韵类例》。陈氏认为杨仲修进一步将四十四图删并，便可成为二十图的《切韵指掌图》。这种说法，表面看来的确象是很有道理，但仔细一考，又觉得他这里忽略了三条事实。其一，杨仲修本是名人，又有这方面的著作，设若真是他改并自己的《切韵类例》为《切韵指掌图》，用不着借用司马光的大名。其二，《切韵指掌图》根本不是对《切韵类例》的简单改并，而是韵母简化规律上的过程，是比《切韵类例》水平高得多的作品。其三，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，“音韵庞驳，师法多门。”（见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五）编写这类书的人很多，如谢暉的《切韵义》、《纂要图例》，王宗道的《切韵指玄论》，杨傖的《韵谱》等，就都是这时期的韵学作品。此外还有释氏的作品及北方传入的《四声等子》等。综合所有这些因素，看来陈氏的说法理由就不充分了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了。

那么究竟是谁伪託司马之名编撰了《切韵指掌图》呢？笔者私下认为，嘉泰三年（1203）序、刻《切韵指掌图》的董南一大可怀疑，其理由有三。

其一，董南一行实无考，我们只知道他是鄱阳人，淳熙二年（1175）乙未科詹曠榜进士，其余官诰，行状一无所知，表明他的确是个不见经传的人物。既非封疆大吏、达官贵人，又非硕士鸿儒，埋头下点苦功夫，做点实学问，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。然于封建社会，无名之辈的著作要想流布于世，往往是困难重重。託名学问大家，便可流传开来。董南一于《切韵指掌图》，何尝不存在着这种可能？

其二，前边说过，南北宋时期“音韵庞驳，师法多门”，许多人编写了不少音韵学方面的著作，但流传下来的很少。董南一很可能充分利用了这些不太成功不太高明的音韵著作，加以锤炼

提高、去粗取精，从而编纂成《切韵指掌图》这样水平较高的韵学作品。

其三，细审《切韵指掌图》董南一后序，发现其于韵学韵书还是比较熟悉的，然于行文中却有不少模棱两可之处。例如他说“《图》盖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所述也。”这句话似是而非，似肯定似未肯定。当然存在着别的伪託，他不清楚，而有不敢肯定的可能。但也不能排除他自己伪託，而故意制造这种似是而非假象的可能。又如“公尝被命修纂《类篇》，古文奇字搜猎该尽，而留心音韵，尤有若斯《图》者。”这话又是模棱两可。你说不对吧，司马光又的确于治平三年被命继纂过《类篇》；你说对吧，司马光于《类篇》又只不过是组织力量继续缮写，写毕奏进而已，于实际工作根本没做。一个根本没做实际工作的人，怎么可能留心音韵，并撰成《切韵指掌图》呢？象这样模棱两可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两处，不过本质都是一个，就是这种模棱两可很可能恰是隐藏了董南一伪託的马脚，故不再赘举。

上述三条，都是主观的分析和推想，决不是科学的结论。这里大胆提出来，无非是借以引起讨论。想来若有博学之士稍事留心，《切韵指掌图》作者究竟是谁，可能并不难解决。

关于《切韵指掌图》的版本，自南宋嘉泰癸亥，即一二〇三年起，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止，中经元明清，前后大概共有八个版本。

一、宋嘉泰三年，鄱阳董南一刻本。此为《切韵指掌图》的最初刻本。考现存南宋绍定年间刻本所谓司马氏四世从孙跋文，称：“右先文正公《切韵指掌图》，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，深有补学者，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。”这道跋文写于绍定庚寅，即绍定三年（1231），距嘉泰三年（1203）仅有二十八年。故“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”，当即指董南一刻本。今考道光《金华县志》，称：“丽泽书院在旌孝门外，即印光寺故址。初，宋吕祖

谦作书堂于城西，覩前二湖悦焉，取《易·兑象》传义，以丽泽名。及卒，乡人为祠以祭。淳祐间，州守许应龙建于双溪之浒以祀……。”证明婺州确有丽泽书院。不过此本早已失传，不复可见。

二、宋绍定三年，司马氏四世从孙越之读书堂刻本。此本序文八行十五字。检例七行十六字，又八行十八字，又八行十六字，又十行十七字。次字母图，次类隔图，次字母四声图。其字母标以阴文。末有嘉泰癸亥番暘董南一后序。序后有绍定庚寅四世从孙□跋。后序及跋皆行书，半叶九行。末叶栏角有“程景思刊”四字。全书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口下方记刊工姓名：顾、林宠、信、叶室、万全、永、周文昌、万可、万千、陈琳、林宏、林盛、雯、永宁等。全书行格疏朗，字大如钱，墨似点漆。字体仿颜平原，敦厚方满。卷中凡遇弘、贞、桓、玄、朗、匡，均缺末笔。所有这些特点，均属宋版风格。四世从孙□跋称：“右先文正公《切韵指掌图》，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，深有补学者，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。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□敬书于卷末。”考康熙《绍兴府志》，称：“诸暨梁武帝读书堂，在永福寺，有砚水井。”康熙《诸暨县志》亦称：“梁武帝读书台、砚水井，在光山永福寺内。有萧道成碑，宋朝散郎李靴记略。”足证其“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”，是完全可信的。

且考明司马晰所编之《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》，知“司马攸字季思，温公曾孙，出镇广州，终开国伯吏部侍郎。所交皆天下名士，洪迈辈乐与之遊。凡温公书，必梓行之。于《资治通鉴》得公凡例于残稿中，撮其要例传于世，予夺之旨大明，克昌家学，尤有功于文正。高宗南渡，扈从寓杭，今为会稽山阴之始祖云。”这段话表明司马光的曾孙司马攸是南北宋之际人，且于靖康变后扈从高宗南渡，寓居于杭，为司马氏徙居会稽山阴之始祖。靖康之变发生在一一二六年，绍定庚寅为一二三〇年，相距近百年。

跋的落款称“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四世从孙□敬书于卷末。”就是说做为司马光子孙的四世从孙，于绍定间重刊《切韵指掌图》，于年序上也是完全可信的。前边说过了，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距绍定庚寅已有一百四十四年，又是从孙，不识《切韵指掌图》为他人伪託，误以为就是族祖司马光作品，因而重刻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此本有丛书堂印、大雅、任侠自喜、陈氏惟寅、沈弘正印、字公路、天禄琳琅、天禄继鉴、嘉庆御览之宝等藏书印记。说明此本在明代曾为吴宽旧物。清嘉庆时归入内府，为天禄琳琅珍藏。清末民初散出大内，展转入琉璃厂文友堂，后归北京图书馆。

三、影写宋绍定本，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有宋绍定三年刻本的影抄本，《四部丛刊》续编所收之《切韵指掌图》，即据此影抄本影印。清末同文书局亦曾石影过《切韵指掌图》，所据是另一个影抄宋绍定本。但这两个影印本实际上同源于一宋绍定三年读书堂刻本。

四、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还著录有影元抄本，卷首附司马光像及像赞，《检例》则由宋本的前边移于后面，内容亦有所增加。这部元刻本的原书早已不知下落，连影元抄本之留存亦不清楚。

五、明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刻本。此本将《切韵指掌图》厘为二卷，后附邵光祖补撰《检图之例》。永乐间纂修《永乐大典》时，由于未见此书之宋、元刻本，便把这个洪武刻本收了进去。现在这个洪武刊本似也不存于人世了。

六、清代所修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清乾隆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《切韵指掌图》的宋、元、明刊本均未收集到，只好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集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个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将《切韵指掌图》分为三卷，即正文二卷，《检例》一卷。且于提

要中说“旧有《检例》一卷，光祖（指明邵光祖）以为全背《图》旨，断非光作，因自撰为《检图之例》，附于其后……。光祖据光之《图》以作《例》，则其《例》仍与《图》合……。光《例》既佚，即代以光祖之《例》，亦无不可矣。”这段话完全是无稽之谈。从现存宋绍定本《切韵指掌图》看，书前本来就有《检例》。洪武二十三年重刊此书时，将《检例》从书前移于书后，并增加了邵光祖补撰之内容，辑入《永乐大典》时当无遗漏。而《四库全书》收辑时，馆臣胡涂了，误认为原书《检例》散佚了，《大典》中所存者，为明邵光祖所撰，且编造出上面那段话。今以宋本此书《检例》与之勘核，发现其中十之七八都还是宋版旧有的。首叶《捷法诗》、《检类隔切例》、《广韵类隔今更音和》宋版原无，但亦非邵光祖所补，而是出自元朝人之手。只有后半部分《检图之例》以下的內容，才是邵光祖所补。四库馆臣不明这些真象，硬把《检例》全归于邵光祖，这不仅是错误的，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。所以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切韵指掌图》是最不好的本子。

七、清张海鹏刻《墨海金壶》丛书本。张氏《墨海金壶》丛书所收之《切韵指掌图》，实际是依据《四库全书》本重刊者，但经过黄廷鉴、张金吾校勘，改正了音释上的某些错误，比库本要好，但不脱库本羁绊。

八、一九三〇年渭南严式海刻《音韵学丛书》本。此本所据为同文书局之石印本，实际祖于宋绍定本，且校以张海鹏所刻《墨海金壶》本，择善而从，并附有校勘记。然《检例》部分则全依《墨海金壶》本。一九六二年再次影印《切韵指掌图》时，所据底本就是這個严氏刻本。

上面谈了《切韵指掌图》的八种版本，实则只有宋本、元本、明本、库本四个系统，其实还有清抄本存世。从上述八种版本的递传关系看，宋本此书自宋绍定以来，始终没有直接的再版或者是

影印本传世，今天中华书局据北图所藏之宋绍定原刊，依原样影印出版，非但可使此书的其他所有传本得以是正，于音韵学研究也将是很有意义的。

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。

注：此文撰写过程中，还未见到过日本藏本，根据还只是傅沅叔先生的纪录。前不久，曾托日本朋友影印日本图书寮此书书影，设若此本与傅先生所记径庭，而真与北图藏本相同，那时再予更正。

笔者识。

八四年十一月，日本迹见女子大学教授和泉新先生寄来图书寮所藏《集韵》书影数叶，经与北图藏本勘核，证明确系不同版本。

笔者再识

《护国运动资料选编》问世

李希泌、曾业英、徐辉琪三同志编辑的《护国运动资料选编》一书，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本书所选资料，从1915年8月筹安会发生前后起至1916年7月军务院撤销为止，取材宏富，内容系统，重点突出。所选资料，绝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，其中不少是未刊的档案资料和私人收藏的抄件与信札。如《护国之役总司令部命令抄》与《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》都是艾思奇同志家属收藏的抄本（艾思奇同志的父亲李曰垓曾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的秘书长）。《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》中的第三支队战斗之经过，纪录了当年朱德同志担任第二梯团第三支队的战斗经过和报告，弥足珍贵。资料的编排方法，一般依据事件和时间的先后顺序，但个别问题为照顾内容的完整性，集中编入有关章节，以便读者参考。

全书分为七章，收入文章，函札共四百四十一件，每章后的附录尚不包括在内。此外，书末附有《护国运动大事记》与《人名字号对照》，以利读者检索。

• 李遵义 •